

英氏家族历经晚清、民国、国共之争、新中国成立、反右、“文革”、改革开放等时期,因为“吃洋饭”,这个家族总是身处中西交锋、中西矛盾、中西交流的第一线……

## 英氏家族： 面向世界的微观样本

英达是英氏家族的第四代传人,他透露了这个神奇家族的成功奥秘:“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3个字——学外语。”

英达的曾祖父英敛之是清朝末年中国天主教代表人物,他创办了《大公报》和辅仁大学,也是通过教会的渠道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。

英达的爷爷英千里12岁就赴欧求学,精通英文、法文、西班牙文和拉丁文,1948年后到台湾,编写了从初中到大学的系列英文教材,余光中、马英九都是他的学生。

英达的父亲英若诚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,英文讲得不逊母语。



前排从左至右为:英敛之、英千里,后排为英若诚、英达。(此图为制作效果)

### 英敛之:创办辅仁大学

英敛之是清代满族正红旗人,22岁便笃信天主教,与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来往密切。戊戌变法失败后,英敛之亦在清廷的缉拿名单上,他带着妻儿先后避难于香港、越南,后来定居天津。

独生子英千里12岁时,英敛之就送他到英国去学习强国之术。英千里走后不久,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。8年后,他才第一次回国。

因为主张“全盘西化”,英敛之也闹了不少笑话。他提倡穿西装,找了个日本裁缝做了套西服,勇敢地穿上,到外面逛了一大圈,为的是叫“长袍马褂们”好好看看。

他不知从哪儿听说,西方绅士星期

天必须骑马,特地买来几匹马,每到礼拜天就领着妻儿,骑马到街上跑一圈。只是,这个别出心裁的“节目”苦了他娇小瘦弱的太太。

他自己穿西服不算,还想在全家推广,苦于弄不清西方女性服装的式样,就托人到哈尔滨买了一套,让太太穿上拍照。

1924年,英千里自欧洲回国成亲,英敛之意识到儿子虽精通西学,却连中国字都写不好,更不能指望他干预时政。

自1902年创办《大公报》到1916年将报纸盘给其他股东,英敛之对西方世界的推崇早已被现实打破,在儿子教育上的“失败”,是他“全盘西化”的又一大挫折。

1917年,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廷,力主在中国开办天主教高等教育学校,1925年,罗马教廷亲自委派美国本笃会到华办学。这所大学,就是亚洲唯一由罗马教廷直接设立的天主教名校辅仁大学,校名是英敛之取的。他的同道好友、晚年捐资创办上海震旦大学的马相伯曾主张以“本笃”为校名,英敛之坚持取名“辅仁”,典出《论语》中的“会友辅仁”。

英敛之还创办了北京第一所女子中学——静宜中学,英若诚的母亲蔡葆真女士刚过门就当这所学校的校长,时年19岁。北京培根小学也是英敛之创办的,他的妹妹英木狄任校长,英若诚和英若识都在这所小学念过书。

### 英若诚： 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

改革开放后,英若诚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用场,《推销员之死》、《哗变》、《请君入瓮》、《芭芭拉少校》、《上帝的宠儿》都是由他翻译并引进北京人艺的外国戏。

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中国,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。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,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:《家》和《十五贯》。他是当时北京人艺在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,《忽必烈》、《末代皇帝》、《小活佛》、《马可·波罗》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。

他说:“我们提倡爱国,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,加以对比,祖国才可爱。”

他还说:“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,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……我会点儿外文,能看些洋书。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,像《推销员之死》、《哗变》等,我觉得是外国文化的精华。但是,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,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,我得把它翻译出来。”

1986年,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,主管艺术团和艺术院校。曹禺送给他一幅字:“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,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。”

身居高位时,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。1990年6月,他卸任了,锁上办公室的门,交出钥匙,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:“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,看我的戏。”

晚年,他躺在病榻上,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觉。神志清醒的时候,他和亲人说,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,但是“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,回想我的一生,在我所有的经历中,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,这是我从我祖父、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。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了我”。

“我们家一代一代都在做的事情就是学外语,我们是脚踏实地的‘假洋鬼子’。”英达这样评价英氏家族。

英家人才太多,英达曾说:“有时,我觉得自己挺牛的,再一想,还是不行,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没法比。”

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,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。英若诚最先去了美国,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。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、英达的姐姐英小乐、英壮的妹妹英凡、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。

英家第五代有十多人,一多半都在国外成长。现在,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,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。

(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)

### 英千里:改变家族命运

对于英家人来说,英千里才是真正改变了家族命运的人。他和妻子蔡葆真(晚清山东巡抚、民国教育总长蔡儒楷之女)一共生了9个子女,长女七香、次子若敬患病早逝,其余几个孩子依次为若勤、若诚、若聪、若采(女)、若识、若智、若娴(女)。

英千里回国后,先是在辅仁大学任教授,后又教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英国文学。那年头,同时打3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1个月能拿到1000块大洋。他在京郊买了别墅,每年夏天,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别墅度假。

英千里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,他的孩子全都受了洗礼,都有教名,英若诚从小就担任教堂祭坛独唱,祷告和赞美诗也是他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。蔡葆真也是一名天主教徒,精通英文和法文。

这样的夫妻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多见,蔡葆真奉行“树大自直”的教育理念,给予子女最大的自由空间。英千里即便给孩子们立规矩,也“总是很绅士”。

“我大哥若勤10岁的时候,说话冒犯了母亲,父亲让他趴在桌子上,用一根手杖打他的屁股。这个过程他弄得像一个仪式一样,我估计那可能是英国式的打屁股。”英若识说,他对

父亲印象最深的是晚上的“床边故事会”,“我父亲有3间书房,我们从小就在里面胡乱看书。晚上他情绪一高,就把我们叫去听他讲希腊神话,每天讲一段,讲得特别生动,我们特别感兴趣”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英家失去了这份快乐。英千里和辅仁大学的一些爱国人士秘密成立了地下抗日组织“炎武学社”,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思想。1942年,日伪特务把他抓进监狱关了3个月,用尽刑罚,一无所获,只好将他放了。

1944年2月,他再次被捕,国民政府起初以为他已英勇就义,还在重庆为他举行了追悼会。他的孙辈英宁为此特别钦佩他,“一个家族出名人不难,出英雄不易呀,老虎凳、辣椒水,那可是动真格的!老爷子一介寒儒,能视死如归,不屈不挠,了不起。别人我不知道,反正我是做不到我爷爷那样”。

一年后,日本投降前夕,英千里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出狱。

英千里知西不知中,英若识讲了一件趣事:“他12岁出国,像个外国人,中文不如英文好。他当教育局局长的时候,很多人找他题字,其实都是我母亲代他写的。”

英若诚当时从天津圣路易中学毕

业,已经获得免试进入剑桥大学的资格。这时,英千里与儿子长谈了一次:“当初你爷爷把我送出去,是希望我从小了解西方世界的科技和文明,将来好为自己的国家做事,可他万万没有想到,这造成了我一生无法弥补的欠缺。我12岁出国,24岁回来,完全不了解中国社会,很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了。”他劝儿子以自己为鉴,放弃剑桥,改在国内上大学。

英千里告诫他的子女:“长大之后,一不可为官,二不可从艺。”英若诚清华大学毕业后,就跑到北京人艺当了演员,后来又官至文化部副部长,这些都是他的老爷子始料不及的。

1948年12月,北京已被解放军围城,英千里作为国民党政府“大陆人才抢救计划”中的重要人物,和胡适等人匆匆飞往南京。他到台湾后与政界再无瓜葛,专心教书。

英千里走后,蔡葆真带着7个孩子艰难谋生。她卖了一些古董维持生计,凡是在读的孩子,一个都不让他们中断学业。丈夫寄来的钱,她都拿去还了债。

1950年前后,蔡葆真写了封信,让丈夫再寄一笔钱,这封信下落不明,家人从此与英千里失去了联络。英千里在台湾恪守着天主教徒的生活准则,一生没有另娶。